

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综述

张卓群 张 涛 宋梦迪 刘宽斌

摘 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当前阶段我国经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抓手。作者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了新发展理念五个方面单一维度指标评价和综合指标评价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单一维度指标评价研究深浅不一，综合指标评价研究缺乏系统性，进而提出了分层次的宏观—微观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并建议引入舆情大数据作为传统数据的补充，构建智能评价平台，为建立科学、合理、能够指导实践的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提供研究基础与参照。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 指标评价 宏微观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0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51X (2019) 04-0098-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中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经济发展进程，很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集中出现。目前，国内的经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产业、投资、消费转型压力巨大。依靠资源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整体升级。

国际社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关注到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1980 年，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与测度”（2017—201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房地产价格风险传染机制研究”（批准号：2020YQNQD0031）。

【作者简介】 张卓群（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研究部副主任，邮政编码：100028；张涛（1973-），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732；宋梦迪（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刘宽斌（1987-），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邮政编码：400715。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旨在通过建立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机制，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发展需要。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方式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共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发展方案，旨在通过改变发展动能、促进发展平衡、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发展外延、实现发展共享来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转型。本文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五大发展理念单一维度指标评价与综合指标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而就建立科学、合理、适用的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以期为构建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发展评价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评价标准提供参考。

二、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着力”，即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2019）。新发展理念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灵魂，深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真价值（金碚，2018），在深化“发展”内涵的同时，形成发展、改革、开放命题的有机统一（刘伟，2017）。

创新发展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三次科技革命均是依靠创新实现科技突破发展，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进而促使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中描述经济增长的Solow模型，提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但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人均产出永久性增长。Porter等（2002）提出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元素为驱动力的发展，第二阶段是生产效率为驱动力的发展，第三阶段是创新生产为驱动力的发展。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因此，创新发展是目前化解“三期叠加”问题，实现增长速度变化、产业结构转化、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

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要素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新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Krugman（1998）以区位论为基础，提出通过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中国协调发展的概念内涵更为宽泛，除了区域协调、产业协调之外，城乡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也是其重要内涵。通过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平衡与整合各方利益，缓解国内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能够推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总体进步。

绿色发展是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跨越的必由之路。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言,人类经济发展本真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金碚,2017)。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以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和Meadows(1972)的《增长的极限》的出版为代表,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1972年,联合国召开全球第一次综合性环境保护会议——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上升到国际高度。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绿色发展的概念逐步在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在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方面开展了有效合作。中国绿色发展的转型进程,整体上是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到突破工业文明发展极限,再到迈向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的过程(潘家华,2018)。这个进程的背后,伴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以及民众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两山”理论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对绿色发展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绿色发展也成为对“两山”理论的深刻践行。绿色发展在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不断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迈进。

开放发展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开放发展的研究雏形可以追溯到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从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到David Ricardo的相对优势理论,从二战后主张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的新贸易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后注重专业化分工的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同贸易全球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主流声音。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其宗旨就是以开放、平等、互惠的原则来降低成员贸易壁垒,增加有效需求,稳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在贸易方面一直寻求开放发展,也在不断致力于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经历了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1979—1991年)、市场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1992—2001年)、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阶段(2002—2012年)之后,中国的开放发展进入了第四阶段——从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阶段(张涛、姚慧芹,2019)。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就需要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倡导人类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共享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遵循。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福利经济学主要关注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分配问题。旧福利经济学派基于基数效用论主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分配愈平等,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新福利经济学派基于序数效用论主张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帕累托改进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而在中国倡导的新发展理念中,共享

发展不仅仅关注效率与公平问题，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直指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七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发展”，国家发展思路越发凸显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共享发展，将使全体人民得到更高的获得感，生活更为体面、更有尊严。

五大理念各有侧重，但同时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统一的新发展理论体系，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在贯彻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做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发挥其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作用，使五者真正形成强大发展合力（马健永，2017），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五大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

在新发展理念提出之前，虽然没有基于五大维度的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但其单一维度的指标评价研究，在国内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和进展。

（一）创新发展指数

200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建立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其目标是通过测度多维度创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2019年，GII测评范围已经涵盖129个经济体，测评条目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等创新投入，以及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创新产出共2个大类7个中类80个具体指标（Dutta et al., 2019）。中国依靠创新驱动发展，GII排名近年来上升迅速，由2007年的第29名升至2019年的第14名，是前20名国家和地区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国内研究方面，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于2013年开始着手编制中国创新指数。中国创新指数以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由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绩效指数合成。以2005年为基年，2018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12，比上年增长8.6%，我国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成效逐步显现，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再上新台阶。省域层面上，赵彦云等提出从资源能力、攻关能力、技术实现、价值实现、人才实现、辐射能力、持续创新和网络能力等八个方面评估省域自主创新能力，并使用波士顿矩阵将31个省份分为创新网络构建市场开拓驱动、人才引进改善创新环境驱动、创新资源人才双向驱动、创新市场需求辐射拉动、创新资源转化的技术驱动、创新资源攻关水平强力驱动等六类创新驱动模式和起步、崛起、繁荣、成熟四个创新发展阶段（赵彦云等，2009；赵彦云、吴翌琳，2010）。

城市层面上,杭州市是国内最早开展创新指标评价的副省级城市。杭州市政府于2008年发布“杭州创新指数”,主要从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三个方面评价杭州市自主创新的现状、水平与差距(杭州市科技局,2008)。随后,又有多个机构或学者分别就太原市(袁志红,2012)、北京市(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广州市(刘明广,2016)、沈阳市(王海军、成佳,2016)、青岛市(王志玲等,2018)的城市创新指数进行了研究和测评。

(二) 协调发展指数

区域协调层面上,覃成林(2011)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协调发展体系,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应该由市场、空间组织、合作、援助和治理五个方面构成,每个机制独立产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用的同时也通过相互联系产生区域协调发展合力。洪开荣等(2013)利用熵值法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四个维度估算了中部地区1999—2010年协调发展情况。刘建国(2016)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北京市各区县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并运用协调度模型,分析北京市各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产业协调层面上,Krugman(1991)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地区专业化指数,又被称为K-spec指数,用于考察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唐志鹏等(2010)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将三次产业划分为26个经济部门,使用主成分分析、多项式回归计算得到各部门的协调度。孙轩(2016)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协调发展多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包括经济性指标、专业性指标、平衡性指标和友好性指标四个大类。吉亚辉和罗朋伟(2018)从专业化分工角度采用采掘业和制造业的数据计算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协调指数。赵翊(2019)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区域分工指数、区位熵方面度量了宁夏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程度。

城乡协调层面上,曹炳汝(2015)对全国31个省份2000年和2010年的城乡发展协调情况进行了测评,测评体系包括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农村发展综合指数两个次级指数,城市方面下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农村方面下辖农业生产条件、农村经济条件和农村生活条件。张立生(2016)收集中国333个城市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及收入数据,构建了城乡相关系数、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用于研究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情况。

(三) 绿色发展指数

Rees(1992)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指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生存所需要的或者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Wackernagel(1994)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概念。通过计算生态足迹,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生态足迹以其简单明晰的属性,迅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目前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研究的核心指标之一。

国内研究方面,以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课题组建立了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 3 个一级指标及下属 9 个二级指标和 62 个三级指标，并运用该套指标体系对全国 30 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程度进行了连续跟踪评价，研究报告从 2010 年起以专著《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的形式发布。2013 年，他们在省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与省域体系一脉相承，这套指标体系的一、二级指标没有变化，三级指标减少至 45 个。至 2016 年，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的测评范围已经涵盖全国 100 个主要城市（北京师范大学等，2016）。此外，在县域层面研究上，郭永杰等（2015）运用熵值法和改进的 TOPSIS 模型对宁夏 22 个县（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主要指标包括绿色发展增长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资源与生态保护、环境与气候变化、绿色投资、基础建设和城镇建设、环境治理等九大类。李国平和李宏伟（2018）采用由压力、状态和响应构成的 PSR 模型建立绿色发展指数，测度了陕西 36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2011—2015 年绿色发展状况和绿色减贫效果。

此外，2016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考评的重要依据。前者涵盖了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和公众满意度 7 个一级指标及下属 56 个二级指标。后者涵盖了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年度评价结果、公众满意程度和生态环境事件 5 个一级指标及下属 23 个二级指标。两大指标体系的印发表明绿色发展理念在政府推动下由概念向实体转化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四）开放发展指数

由瑞士 KOF 经济学会每年发布的 KOF 全球化指数（KOF Globalisation Index, KOFGI）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KOFGI 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三大一级指标及下属 24 个具体条目，测评数据的主要来源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Gygli et al., 2019）。近年来，在 200 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 KOFGI 排名基本在 70~90 名之间浮动。此外，美国科尔尼（A. T. Kearney）公司与《外交政策》杂志也曾在 2001—2007 年发布过全球化指数，世界银行等机构不定期对全球主要国家的开放程度进行过测评。

国内研究方面，国家层面上，李翀（1998）开展研究工作最早，其基于对外贸易、金融和投资比率加权平均计算对外开放程度，实际上并未提出完整的开放指数指标体系。胡智和刘志雄（2005）、孙丽冬和陈耀辉（2008）又分别进行了扩展，前者加上了实际关税率和生产开放度，后者加上了经济合作开放度和旅游开放度。省域层面上，李青和黄亮雄（2014）基于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三部分内容建立了开放经济指数，涉及的具体指标主要为运输指标、贸易指标和资金指标。谢婷婷和郭艳芳（2016）从国际开放、省际开放和省内开放三个维度建立省域经济开放度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并计算 28 个省份的开放指数，继而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驱动省域开放的主要因素和影响程度。陈威等（2016）认为对外贸易、

对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旅游是构成对外开放评价体系的主要支柱，并使用29个省份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就对外开放度整体差异状况、时空演变特征、空间关联模式以及驱动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城市层面上，张可云和项目（2011）分析了城市国际化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挑选了12个宏观经济指标，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国内省会城市国际化水平进行排名。李明超（2017）设计了基于区域竞争力的城市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综合竞争力、发展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三大支柱。韩言虎等（2018）结合“伊斯坦布尔”国际化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由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四个子系统组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化水平测度模型。

此外，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于2012年在博鳌发布《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对全国31个省份的开放程度进行了排名。2013年对全国32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进行了排名；2014年将城市测评范围扩展到了83个；2016年出版专著《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经过多年持续研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经济开放度、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的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稳定在30多个。这套指标体系较为科学合理，完整度和成熟度都较高，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五）共享发展指数

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发布包容性发展指数（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IDI），该指数致力于推动世界范围内形成包容发展共识，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缓解近年来越发严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IDI主要通过收入与发展、包容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三大维度进行评价，并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开排名（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2018年，中国在74个参评的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26位。

国内关于共享发展评价的范围不仅限于消除不平等问题，同时还关注发展成果如何由人民共享。褚福灵（2016）认为共享发展指数需由两方面构成，即收入分配均衡度和社会保障健全度，将“分配结构合理，收入增长同步，收入差距缩小，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适中，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增强”等方面的基础数据指标化，进而形成共享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其对构建细节、数据选取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见，但是并没有进行实际测算。李暉和李詹（2017）提出了一套更为完整的共享发展指标体系。这套评价体系由经济普惠、社会公平、政治清明、生态和谐、文化繁荣五个维度的37项基础指标构成。相比而言，李暉和李詹（2017）的研究更为精炼，不过依旧存在没有评估数据的覆盖度、没有提供实际测算评价结果等问题。赵培红等（2018）对共享发展的程度开展了实际测算，他们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消除贫困现象、发展教育事业、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八个方面构建共享发展指标体系，并对京津冀三地整体和各自的共享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提升京津冀共享发展水

平的政策建议。

（六）五大发展理念指标研究评述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可以发现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绿色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较为成熟；而协调、开放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创新发展方面，城市、省域、国家层面上的创新指数研究已经初具基础。各创新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存在一定的共性，如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创新潜能、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等一级指标体系得到了广泛认可。绿色发展方面，国家、省域和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指数研究都较为丰富，多部委联合推出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成为地方政府施政成效的考评依据，成功应用于指导实践之中。协调发展方面，从技术角度来讲，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每个方面在指数设计、合成方法上相关研究的共性较少，未能形成有效交集；从研究内容来讲，过往研究基本基于某一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缺乏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全面协调研究。开放发展方面，国家层面研究中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三大核心指标，大量研究均围绕核心指标进行增减；城市和省域层面上同样存在未形成公认核心指标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成熟程度最低，目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共享发展这一概念明确提出的时间较晚，不过其思想一直贯穿于执政兴国的过程之中。第二，国外对于共享发展的理解和国内有差异，国外主要强调收入、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均等，倡导包容性增长；国内共享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包括国外研究要义的基础上，更注重经济社会共建、发展成果共享。总体来看，对于共享发展指数的研究基本处于萌芽阶段，值得进一步探索。

需要注意的是，自2015年以来，除了对五大发展理念独立研究之外，基于五大维度对新发展理念开展综合指标评价研究的工作同时逐步开展，以下研究较具代表性。张亚斌和赵景峰（2017）设计了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计算了我国整体、分省份、分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发展质量指数，认为除协调发展外，其余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中稳步上升态势，且东部优势明显。杨新洪（2017）以深圳市为研究对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进战略、创新驱动、新兴产业上突出深圳特点，提出了包括37项二级指标的“五大发展理念”统计评价指标体系，认为2011—2015年深圳市新发展进展显著，特别是创新发展十分突出，但协调发展是其短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2019）认为五大理念涵盖了过去20多年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构建了具有三级指标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通过德尔菲法和熵值法赋权计算指数，课题组认为全国和各省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创新的实际应用成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绿色环保政策稳定性、对内开放力度、城乡初次分配差距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就基于五大维度的新发展理念综合指标评价研究情况来看,目前相关文献数量不多且研究缺乏体系,基本是基于某一个行政层级或某一个地区的研究,除张亚斌和赵景峰(2017)之外,鲜见多层级的研究,且不同行政层级是否适用于同一套指标体系值得商榷。因此有必要在充分理解新发展理念内涵和总体思想的基础上,设计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并且能够指导实践的新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四、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可能的扩展方向

新发展理念及其五大维度的指标评价研究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研究程度深浅不一、系统性有待提高等问题。随着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相关理论及指标评价研究必然进一步丰富。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新发展理念理论与实践研究。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成果(顾海良,2017),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在长期改革实践中逐步建立的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因此无论是新发展理念的理论研究、指标评价还是实践应用,均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第二,以发展内涵、科学评价为导向,建立分层次的宏观-微观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均有各自独特的含义与指向,相互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闭环。因此需要在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精髓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构建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指导实践工作,需要构建一套由宏观到微观的分层级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见图1)。首先,按照行政层级划分为国家、省域、城市、县域,构建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辅助政府开展发展决策。其中国家层面为宏观指导,指明未来发展的全局方向;省域层面承上启下,贯通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城市层面为核心主体,构成承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间力量;县域层面为基本单元,形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基础。其次,以城市群为主体,开展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打破行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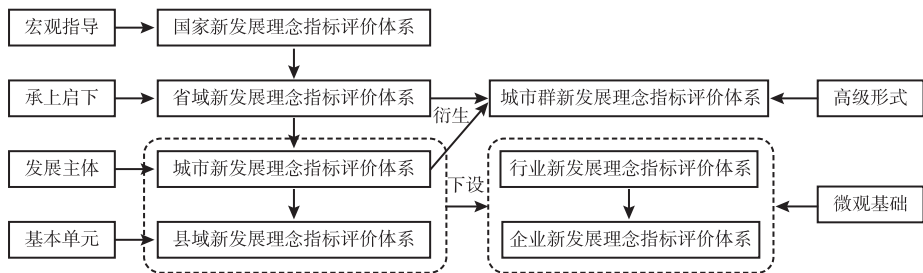


图1 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构建设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域壁垒，推动新时代经济发展迈向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最后，城市或县域层面下设立行业和企业新发展指数，有利于政府摸清微观主体的发展状况，并且基于量化得分，精准出台行业发展政策和企业奖惩政策，更高效地运用政策工具和财政补贴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以宏观、微观数据为基础，结合舆情大数据，打造新发展理念智能评价平台。在构建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时，其在不同层级上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和涉及的指标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以一套标准涵盖所有层级的评价工作，需要考虑不同层级的特点、数据的可取得性和可统计性、指标体系的简洁性等多方面因素，构建分层次的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其中国家、省域、城市、县域和城市群的评价以宏观数据为主，行业和企业的评价以微观数据为主。此外，例如科技、环保、民生、观点、预期、热点事件等重点舆情同样影响着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走向。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舆情大数据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收集、清洗、挖掘，提取核心信息作为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新发展理念的评价。将大数据与传统宏观、微观数据整合后，可以利用软件技术，开发和构建新发展理念智能评价平台，形成数据采集整理、新发展指数计算和研究报告推送的自动化、智能化，为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与总结了新发展理念单一维度指标评价与综合维度指标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讨论了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研究可能的扩展方向，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基于五大维度开展的新发展理念综合指标评价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缺乏体系。而对于单一维度发展理念的指标评价研究程度深浅不一，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指标评价研究较为成熟，具有大量的学术参考；开放发展次之，学界对于细化指标体系没有达成共识；协调发展相关研究更注重某一方面的协调，如产业协调、区域协调等，缺乏总体协调的研究；共享发展指标评价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第二，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的综合研究具有巨大的空间。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新发展理念理论、指标与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发展内涵、科学评价为导向，建立分层次的宏观-微观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此外，可以将舆情大数据引入指标评价体系之中，结合信息技术，打造新发展理念智能评价平台，实现新发展理念指标研究的智能化和平台化，为决策提供智能工具。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能够指导实践的新发展理念指标评价体系需要从思想研究到实地访谈、从专家咨询到指标编制、从指数试算到平台开发，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指标体系才能真正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起到实效。

参考文献

- 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国家统计局(2016):《2016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曹炳汝(2015):《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测度》,《城市问题》第11期,第18~22、37页。
- 陈威、潘润秋、王心怡(2016):《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第3期,第53~60页。
- 褚福灵(2016):《共享发展的内涵及衡量标准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第6期,第30~32页。
- 顾海良(2017):《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意义》,《经济研究》第11期,第15~17页。
- 郭永杰、米文宝、赵莹(2015):《宁夏县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第3期,第8、45~51页。
- 韩言虎、杨艳、郑成华(2018):《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化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第180~181页。
- 杭州市科技局(2008):《杭州创新指数介绍》,《杭州科技》第4期,第9~11页。
- 洪开荣、浣晓旭、孙倩(2013):《中部地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与比较分析》,《经济地理》第12期,第16~23页。
- 胡智、刘志雄(2005):《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世界经济研究》第7期,第10~17、25页。
- 吉亚辉、罗朋伟(2018):《产业协调与区域经济协调的耦合研究——基于中国四大板块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开发研究》第5期,第15~21页。
- 金碚(2017):《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城市与环境研究》第3期,第3~15页。
- 金碚(2018):《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第13~15页。
- 李翀(1998):《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经济研究》第1期,第28~31页。
- 李国平、李宏伟(2018):《绿色发展视角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减贫效果评价》,《软科学》第12期,第93~98页。
- 李晖、李詹(2017):《省际共享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求索》第12期,第87~95页。
- 李明超(2017):《基于区域竞争力的城市国际化评估与提升路径》,《企业经济》第10期,第127~133页。
- 李青、黄亮雄(2014):《中国省际开放度的经济指标体系与政策走向》,《改革》第12期,第118~126页。
- 刘建国(2016):《北京市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测度》,《区域经济评论》第1期,第66~71页。
- 刘明广(2016):《城市创新指数设计与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商业经济研究》第6期,第21~24页。
- 刘伟(2017):《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管理世界》第12期,第1~7页。
- 马健永(2017):《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与逻辑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第4期,第27~31页。
- 潘家华(2018):《从生态失衡迈向生态文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与展望》,《城市与环境研究》第4期,第3~16页。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

孙丽冬、陈耀辉（2008）：《经济对外开放度指数的测算模型》，《统计与决策》第 14 期，第 35 ~ 36 页。

孙轩（2016）：《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多指数评价与分析》，《城市与环境研究》第 3 期，第 99 ~ 110 页。

覃成林（2011）：《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经济学家》第 4 期，第 63 ~ 70 页。

唐志鹏、刘卫东、刘红光（2010）：《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测度》，《中国软科学》第 3 期，第 103 ~ 110 页。

王海军、成佳（2016）：《沈阳城市创新指数研究》，《辽宁经济》第 12 期，第 62 ~ 63 页。

王志玲、蓝洁、周文鹏等（2018）：《青岛科技创新指数研究》，《科技和产业》第 6 期，第 79 ~ 83 页。

习近平（2019）：《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第 10 期，第 4 ~ 16 页。

谢婷婷、郭艳芳（2016）：《“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省域经济开放度提升的实证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华东经济管理》第 4 期，第 49 ~ 55 页。

杨新洪（2017）：《“五大发展理念”统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深圳市为例》，《调研世界》第 7 期，第 3 ~ 7 页。

袁志红（2012）：《城市创新指数的设计与选择研究——以太原为例》，《科技管理研究》第 15 期，第 79 ~ 83 页。

张可云、项目（2011）：《中国省会城市国际化水平比较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第 4 期，第 51 ~ 53、60 页。

张立生（2016）：《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地理科学》第 8 期，第 1165 ~ 1171 页。

张涛、姚慧芹（2019）：《新发展理念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河北学刊》第 3 期，第 123 ~ 127 页。

张亚斌、赵景峰（2017）：《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影响——基于五大发展新理念的理论与实证》，《财贸研究》第 3 期，第 1 ~ 10 页。

赵培红、卜凡月、李立国（2018）：《京津冀共享发展水平研究》，《区域经济评论》第 2 期，第 34 ~ 44 页。

赵彦云、甄峰、吴翌琳等（2009）：《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中国 31 个省区市创新能力指数 2008 年实证和 2009 年展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8 期，第 60 ~ 65 页。

赵彦云、吴翌琳（2010）：《中国区域创新模式及发展新方向——基于中国 31 个省区市 2001—2009 年创新指数的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12 期，第 69 ~ 77 页。

赵翊（2019）：《基于产业指数分析的宁夏经济部门协调发展研究》，《开发研究》第 3 期，第 148 ~ 152 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2019）：《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研究》，《行政管理改革》第 1 期，第 35 ~ 43 页。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Dutta, S., B. Lanvin and S. Wunsch-Vincent (2019),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19.pdf [2019 - 10 - 19].

- Gygli, S., F. Haelg and N. Potrafke, et al. (2019), “The KOF Globalisation Index-Revisited”,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4 (3), pp. 543 – 574.
-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3), pp. 483 – 499.
- Krugman, P. (1998),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4 (2), pp. 7 – 17.
- Meadows, D. (1972),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Penguin.
- Porter, M., J. Sachs and J. McArthur (2002), “Executive Summary: Competitiveness and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 Porter, et al. (eds.),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1 – 200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 – 26.
- Rees, W. E. (1992),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4 (2), pp. 121 – 130.
- Wackernagel, M. (1994),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A Tool for Planning toward Sustainability”, Vancouver: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Forum_IncGrwth_2018.pdf [2019 – 10 – 19].

A Review on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dex Evaluation

ZHANG Zhuo-qun^{1,2}, ZHANG Tao³, SONG Meng-di³, LIU Kuan-bin⁴

- (1.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2. CASS Thinktank for Eco-civilization Studies, Beijing 100028, China; 3.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4.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up and sharing” i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important to tackl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bring 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authors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five single-dimension indices evalu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find studies on the single-dimension index evaluation are of various depth while studies on the whole are not systematic. Furthermore, the paper develops a multi-level (including macro and micro) evaluation system, and suggest to integrate big data about public sentiment with conventional data, to construct an intelligent evaluation platform, and provides research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dex evaluation; integr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economics

责任编辑：张莹